



中国企业发展五宗罪

■ 本报记者 钟文

3月9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在全国两会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对网络售假问题表示“要对企业罚得倾家荡产才行”。

就在春节前夕,一场因阿里淘宝网员工点名批评国家工商总局官员一事引发的PK大战,在阿里董事局主席马云与工商总局局长张茅“握手言和”之后才渐渐消解。

时至今日,再去探讨孰是孰非已不重要,但是这场被业界称为阿里危机的PK战中,阿里无论是信用、品牌、影响力乃至直接损失都是巨大的,需要更多的措施、时间来补救已是不争的事实。

假冒伪劣猖獗:全民质量意识的初步觉醒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的大门打开,被禁锢了几十年的中国人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创业热情,特别是以民营企业发祥地著称的浙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随着这种前店后厂、毫无监管制约的民营企业乃至个体工商户的兴起,产品质量问题也随之而来。假冒伪劣冲击着市场,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个时段,有两件标志性事件,开启了人们质量意识的初步萌芽。

创办于1984年的海尔集团,当时还是一个亏损147万元的小厂。1985年,时任海尔电冰箱厂厂长的张瑞敏收到用户来信,反映他们的冰箱有质量问题。张瑞敏查看仓库,发现400台冰箱有76台不合格。张瑞敏面对全厂职工,抡起大锤把这些不合格的冰箱砸掉,从此书写了“要么不干,要干就要争第一”的海尔精神。

就在两年后的1987年,离青岛1000公里的杭州市武林广场,浙江温州市制鞋企业把5000多双劣质皮鞋付诸一炬。

上世纪80年代,温州鞋就是温州人和温州经济的代名词。在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大潮中,温州鞋企一下子发展到6000多家。但是,一些技术落后、工艺低下的企业,试图在邪道上一夜致富,致使大量假冒伪劣鞋冲击市场。杭州市相关部门在一次抽检市场上鞋子的质量时,发现18种鞋子的底板帮头是纸壳做的,其中16种鞋由温州出产。在这个过程中,温州鞋企也遭遇了巨大的代价,超半数的鞋企被迫关门或停产。

1988年6月,中国皮鞋行业第一个行业协会“温州市鹿城鞋业协会”宣告成立。在授牌仪式上,协会联合370多位鞋厂厂长发出倡议:“凡我鞋业同仁,都要以鞋城声誉为重,讲究皮鞋质量,不赚昧心钱。”

至此,中国人开启了一个质量兴起的全新时代。



王利博制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企业在波澜壮阔的经济大潮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简单的梳理发现,企业运行过程中,在质量、品牌、诚信、社会责任、投资等5个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稍有不慎,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面临灭顶之灾,成败就在一瞬间。

皮鞋质量,不赚昧心钱。”

至此,中国人开启了一个质量兴起的全新时代。

品牌建设冲动:标王之死

时间到了90年代,随着质量意识的增强,品牌意识开始深入人心。各大企业各显神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载体树立企业形象,提升企业品牌。当时最有影响力、最快捷的就是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

“喝孔府宴酒,做天下文章。”这一豪气广告来自于1994年央视广告标王。

1994年11月2日,在首届中央电视台广告竞标中,白酒行业的后起之秀孔府宴酒一举击败自家兄弟孔府家酒,以3079万元夺得1995年“标王”桂冠。但随后,孔府宴酒因决策失误、结构调整不力和盲目扩张使得企业很快陷入困境。

孔府宴酒的落败,也开启了央视“标王”的死亡之路。

1995年,山东临朐县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县属小型国有企业秦池酒厂以6666万元的价格击败去年的标王孔府宴酒夺得当年央视标王。1996年,秦池酒厂销售收入高达9亿多元。

1996年11月8日,秦池酒再次以3.212118亿元天价卫冕“标王”成功。然而,标王易得,赚钱却不是那么容易。由于没有及时将经济效益转化为发展后劲,特别是1997年“勾兑事件”遭媒体曝光后,对危机攻关的乏力使得秦池销售一落千丈。

1997年8月,在央视第四届标王竞标会上,80多万元起家的广东爱多VCD以2.1亿元夺得“标王”。就在夺标当年,爱多销售额高达十几亿元,迅速成为生产VCD规模最大的企业。

然而,和前几届标王一样,爱多的风光,也只是昙花一现。随着VCD市场的萎缩,掌门人胡志标盲目实施多元化战略,铤而走险,开始造假诈骗,企业损失回落。2004年2月,爱多掌门人胡志标被法院终审以挪用资金罪、虚报注册资本罪等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25万元。

1999年和2000年,同为广东省企业的步步高VCD连续两年以1.59亿元和1.26亿元蝉联标王。所幸的是,在前几届标王落败之后,这时候企业经营者更加理性的经营品牌,而不是盲目甚至是一夜之间获得成功的那种冲动。

“投放央视招标广告数额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合理评估,而非是否成为‘标王’。”步步高掌门人段永平平静的话语意味着标王“盲目时代”的终结。此后,娃哈哈、蒙牛、伊利、哈药都曾上榜央视的标王,但企业至今都发展得很好。

社会责任缺失:看似坚固的企业大厦一夜坍塌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环境、消费者、对社会的贡献。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个企业成熟的重要标志。这一概念提出至今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一些企业只注重自己的利润和业绩,而不顾企业社会责任,最后看似坚固的企业大厦一夜坍塌。

(下转第四版)

相关

无处躲藏:中国企业环保劫

■ 本报记者 汪晓东

从沿海到内陆,中国部分企业在迁移中完成产业升级转型,然而,还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却身陷环保劫中而无法自拔。

向来被视为“弱势”的环保部门终于在两会期间扬眉吐气——环保将作为硬性指标时刻晒着污染企业。

众多迹象表明,2015年,环保成本进一步加大将是企业发展无法回避的课题。

顽固的落后产能

“产业结构调整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与全国各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共同问题——如何解决资源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转型。而这个过程,企业责任重大。”社会学家简易说。

但一些企业似乎进入了某种怪圈,在发展扩张时,对于环保的投入比例很小。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只要企业所在地生态坍塌,当地政府就会要求企业撤离。

“这样的例子很多。诸如多家媒体报道,十年中九次因为环保问题被点名批评、减产限产甚至被关停,继而因环保连遭各地驱逐的联邦制药。”环保志愿者老宋说。

十年间,这家青霉素原料药生产商的足迹遍布香港、珠海、四川和内蒙古,在向内的迁移中身陷环保迷阵,一路将污染带进内蒙古。

在2013年之前,巴彦淖尔太平、图古日格等氢化企业在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将污染留给当地,而这样的污染企业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中仍占有较大比例。

尽管中国北方陆续关停钢铁、水泥、煤化工等中小企业,转而扶持改良生产工艺的大型企业,但一些地方的第二产业资源性工业比重并未减少。

早在2011年,有媒体报道,山东

昌乐万山集团煤制气项目涉嫌骗取环保批文。文中指出,彼时,焦化项目审批极为严格,山东省原则上2009年下半年起已经不允许建设新的焦化项目,而万山焦化项目2010年建设显然不可能通过审批,而仅仅是煤制气项目偷梁换柱进行违规建设。

简易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化工企业利润已经很低,如果加大环保力度实际上就是增加了企业成本。而企业要想攫取较大利润,偷排偷放,铤而走险的现象便会发生。

“化工等第二产业的布局早在几十年前就形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留下很大隐患。”简易说,这就造成一些企业沉迷于落后产能,继而形成整个产业链发展滞后。

开启铁腕治污时代

有学者告诉记者,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第二产业增速放慢是每个工业城市几乎都要经历的过程,引进产业对此是

有效的补充,但全国各地均对落地企业环保作出要求,借此避免边治理边污染的老路,然而在实施中尚缺一高压线,以杜绝高耗能企业的进入。

然而,上述情况即将得到改变。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我们一定要严格环境执法,对偷排偷放者出重拳,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对姑息纵容者严问责,使其受到应有的处罚。”

2015年,环保部相继约谈了河北沧州、山东临沂、河北承德3个地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临沂代市长张太平在约谈中保证:“今年,我们要使临沂的环境质量有明显改观,三年有一个大变化。”

老宋说,这些整改要求中,环保部破天荒使用诸如“严厉”、“一律”、“必须”、“责令”等强制性词汇。

他说,很长时间以来,环保总局只是批评走过场,长期受制的局面即将改变,这足以说明环保法制重典时代的来临。

纵深



围城中的中国企业

■ 本报记者 汪晓东

据中国财政部数据,2014年中国国企营业收入约4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增幅不及2013年的一半;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4%,增幅比2013年回落2.5个百分点。煤炭、化工等行业利润明显下降,有色行业处于亏损状态。

《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15》认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国有企业低效率的问题会再次显现,一些国有企业极有可能重新陷入经营困境。

这意味着,2015年,中国企业极有可能再现“最困难”时期。

国企瓶颈: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挑战

春寒料峭,冻杀年少。对于这样的阴冷季节多数中国企业似乎也无法应对。

《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15》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改革的深入推进,国企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真正来自市场竞争的挑战。

而对企业来说,这一切早已开始。但问题是,随着市场需求的持续疲软,众多国企开始认识到,这才是它们深陷危机的重要成因。尤其是煤炭企业,面对国家对煤炭在能源比例上的紧缩,其发展将面临更多困难。

根据同煤集团某矿宣传部高通(化名)的回忆,2014年,国家继续缩小煤炭在能源中所占比例,近年来,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逐步从71%下降为不到66%,年均下降幅度为1%左右。

“按说,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几乎不影响煤炭企业的发展。”高通说,“但事实上,煤炭市场下行,众多煤企只能依靠以量补价维持正常运营。”

“2014年,秦皇岛港口存煤曾达到800万吨,于是,去年煤炭的价格和市场需求掉入冰点。”他感叹。

他告诉记者,如果按照400元/吨的保本价计算,2014年,大同左云县一些煤矿坑口煤甚至不到300元/吨,这意味着每卖一吨煤便赔100多元。

2015年伊始,市场需求仍显低迷,对于煤企来说,遇到发展困难是意料中的事。

高通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从某种程度上说,国企的发展已遇到瓶颈,这个阻碍不仅仅是市场的供需矛盾,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觉悟。

春节期间,怀仁中能芦子沟煤业代孝对记者感叹,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煤炭企业要想走出困境,仅仅依靠自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的来说,煤炭企业已进入“多事之秋”。

“企业转型不仅要依靠政府的帮扶和金融政策的支撑,也需要企业顺应潮流,突破原来的经营模式,谋求转型,而这恰恰是国企发展的最大障碍。”他说。

而《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15》亦预警说,在全球经济格局开始重大调整的关键阶段,如果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不能获得实质性进展,垄断行业、投融资体制改革不能跟进配套,国企不能及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不仅重化工业领域的国企将进退失据,甚至分布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乃至金融领域的国企,都可能在若干年后重陷困境”。

民企困境:旧商业模式阻碍创新突破

根据有关数据的统计,中国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寿命不到3年,这与欧美和日本相差近10倍。

山西中小企业联合会郑彤云坦承,我国中小企业管理理念不清晰,财务不健全以及企业信息化程度低都是造成企业生命值低下的主要原因。

“中小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工作效率较低。”山西一家服装企业的财务负责人李中生告诉记者。

“企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管理,其中包括企业文化和用人理念。”他说,这恰恰是中小企业的短板。

李中生告诉记者,比如数字化管理,其旨在降低企业管理成本,精简人员,以增加企业竞争力。

“但问题是,企业负责人只注重市场销售,管理仍然采用夫妻档式的管理。”李中生感到很无奈。

问题似乎很严重。在李中生的眼里,中小企业发展遇到瓶颈是一系列的,但最大的短板在于固守原来的商业模式,缺乏创新突破,这无疑是中小企业迷失在魔方中的致命因素。

“服装一旦出现滞销,企业负责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毫无对策。”他说,一波又一波的危机是个痛苦的轮回,不突破企业就无法发展,甚至可能破产。

崔女士是原浙江金华一家生产箱包的企业负责人,她表示,除上述问题之外,企业财务混乱、信息化程度低亦是她离开箱包行业的重要原因。

“2009年,企业刚起步时,每月销售额能达到20余万元,产品甚至出口到欧美和韩国。”她说,但在企业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管理上的先天不足便表现出来,以至于后期企业负债经营,最终陷入资金链断裂的窘境。

“2015年,中国中小企业将继续面临国内外市场需求疲软、劳动力成本节节攀升、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土地供应日趋紧张、环保成本进一步加大等诸多挑战。”郑彤云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发展所遇到的问题更加不容忽视,如何应对是摆在它们面前最难啃的骨头。